

夏中义集

新潮学案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罔不經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
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
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衆裏尋他千百度回頭蒼
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此等語皆非
詞人不能道然遠以此意解諸詞恐為妄歐諸公所不許也

夏中義集



清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中义文集：第1—6卷合集/夏中义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ISBN 978-7-5520-1956-8

I. ①夏… II. ①夏… III. ①夏中义—文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1471 号

夏中义文集 第1—6卷合集

著 者：夏中义

责任编辑：缪宏才

封面设计：莫 娇

题 签：舒传曦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72.125

插 页：36

字 数：1716 千字

版 次：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956-8/C·153

定价：60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夏中义



生于1949年，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大学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史案。

专著：《百年旧诗人文血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朱光潜美学十辨》（商务印书馆，2011）《学案·学统·学风》（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王国维：世纪苦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王元化襟怀解读》（文汇出版社，2004）《从王瑶到王元化》（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学人本色》（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九谒先哲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新潮学案》（上海三联书店，1996）《实验思想》（学林出版社，1996）《艺术链》（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第二卷说明

本卷收《新潮学案》、《思想实验》。

《新潮学案》所涉 20 世纪 80 年代新潮文论系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的厚重一页。此书评述的诸位学人如李泽厚、刘再复、刘小枫、鲁枢元等，皆是学界公认的新潮文论作者，既然他们或深或浅地影响了新时期思潮，其人其说也就不再是纯个体存在，而已转化为不无思想史意味的学案。此书注重个案研究，旨在通过对上述诸家诸说的逻辑解构及价值重估（微观），以迫近对该时期的大陆人文精神境况的总体俯瞰（宏观）。

此书全部章节，曾以单篇专论在 1989—1996 年分别刊于《文学评论》《二十一世纪》（香港）《学术月刊》《当代作家评论》等杂志。此书由生活·读者·新知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 11 月初版，1997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1997—2002 年在著者执教的华东师范大学作本科生“新时期文艺学史案研究”选修课教材。

《思想实验》蒐集著者主要撰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未辑入《艺术链》、《新潮学案》）的文艺学论文，在 1982—1992 年分别刊于《上海文论》《文艺论丛》《学术研究（内部文稿）》《文学评论》丛刊、《名作欣赏》《社会科学》等杂志。此书由学林出版社 1996 年 1 月作“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之一出版。

本卷附录《新潮学案》序(刘辉扬)、前言、后记与《思想实验》序(刘辉扬)、后记外,还有二文:刘再复《读夏中义的〈新潮学案〉》,原载香港《明报》1997年7月30日;《反映论与“1985”方法论年——以黄海澄、林兴宅、刘再复为人物表》,原载《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3期。



目录

新潮学案

第一章 刘再复：人文美学的主体焦灼	3
第一节 人性模式的审美演示	3
第二节 主体意识的纯情弘扬	26
第三节 价值尺度的非历史阐释	50
第四节 文化重建与自我再超越	61
第二章 鲁枢元等：文艺心理学的重建曲式	74
第一节 犹带梦痕的复苏主题	74
第二节 方法与观念的同步变奏	83
第三节 学科重建中的逻辑噪音	91
第三章 李泽厚：历史积淀说的理学意蕴	99
第一节 积淀：从美学到文化哲学	100
第二节 仁学结构的整体解析	103
第三节 哲学误导与传统抽象	122

第四章 刘小枫：诗化神学的本土语境	141
第一节 从价值自觉到价值证伪	142
第二节 民族精神谱系的个案追问	148
第三节 历史理性主义的神学解构	169
第四节 现代神学的本土化程序	177
第五节 十字架与大陆“文化学热”	208

附录

初版序言	刘辉扬	216
初版前言		223
初版后记		230
读夏中义的《新潮学案》	刘再复	233
反映论与“1985”方法论年——以黄海澄、林兴宅、刘再复为 人物表		235

思想实验

别、车、杜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261
费尔巴哈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	292
评《文学的基本原理》的方法论	324
从诗律看文学形式的相对独立性	342
论现代派绘画的实验功能	361
从托尔斯泰看创作个性结构	375
测不准原理与现代派文学的欣赏	388
文学消遣论	399

文学：作家的生存方式	406
批评短简(五则)	414
附录	
初版序言	刘辉扬 425
初版后记	432

新潮学案

第一章 刘再复：人文美学的主体焦灼

不论未来将给刘再复何种历史评判，作为一个文论家，他已为新时期文坛提供了别具一格的人文美学则是事实。我所说的刘氏人文美学，主要是指其著名“三论”，即由“性格组合论”、“文学主体论”和“国魂反省论”所合成的学术建筑，诚然它尚未竣工，但透过疏疏密密的脚手架，似可隐约辨出它那金字塔形的三棱锥体轮廓，或某种不无逻辑关联的整体性构架。

第一节 人性模式的审美演示

我所以先从“性格组合论”谈起，这不仅因为它是作者所珍视的学术生涯的真正发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涵盖“三论”的刘氏人文美学这一系统构想，本就是在探索“性格组合论”的过程中萌发并逐渐明朗的，同时又使该理论成了构筑刘氏美学金字塔的锥面模板Ⅰ。

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严格地说，它是一种性格形态学，即它重在提炼 19 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高峰期间所涌现的那些经典性人物造型的美学特征及其机制，这些特征与机制用刘再复的话来说，就是性格的一元二重深层整体结构，我命之为刘氏性格定式。

刘氏定式认为性格的美学特征有三：这就是它的“两极性”、“整体性”和“深层性”。所谓“两极性”是指性格构成的一般模式皆呈矛

盾型二重结构，性格本就是这双重性构成要素彼此对立、制约且互渗的精神张力场。性格又具“整体性”。整体性即寓多样性于统一。譬如阿 Q 的性格构成纵然错综，既有村夫之质朴又有刁民之狡猾，既自尊又自卑，既不满假洋鬼子的凌辱却又要调戏比他弱的尼姑，等等，但仍杂而不乱，因为阿 Q 的性格核心是稳定的，一贯的，这便是“精神胜利法”，正是靠“精神胜利法”这一中枢网络统辖了阿 Q 的言行神情，才使其性格在枝蔓横斜的同时又躯干挺立，而不是落叶凋零，形同散沙。性格还要有“深层性”即“灵魂之深”。所谓“灵魂之深”，即“不仅要写出人的表层静态性质的二重因素，而且要写出人的各种性格因素在性格内部世界中的复杂动态过程，写出人的灵魂前进和退却以及堕落时，受到社会关系和反映这种关系的其他心理因素的牵制而发生的矛盾交织状态和矛盾运动历程”^①，简言之，就是要深邃地描绘出人物心底不同性格力量之间的拼搏和由此激起的情感震颤或生命律动。无怪刘再复会特别推崇安娜·卡列尼娜这一形象，因为这位雍容艳美、情欲健旺、敢于冲决戒律、追求圣洁之爱的贵妇人并未能彻底脱俗，正是残存心底的世俗观念使她投身爱的天堂的同时又瞥见了恶的炼狱，她在情爱与母爱、妻性与女性、个性与传统情性之间苦苦地承受着深刻的灵魂的煎熬。正是这一“灵魂之深”使安娜成了列夫·托尔斯泰文学世界中最可爱、最富生命丰采的性格造型。

若将上述刘氏性格定式放到当代文论史背景去作纵向比较，其新意也就格外凸出。先不提它本是对江青版的“美丑分立”即伪古典派的样板戏法则的一大反拨，即使对“文革”前流行甚广，似已成为文坛共识的以群的“典型性格说”而言，刘氏定式仍不愧是独辟蹊径。与以群的性格公式相比，刘再复显然更关切性格所蕴涵的人物个性

^①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50页。

生命,而不像以群那么热衷于性格的“典型性”即性格所衍射的特定时代背景(或谓“社会生活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这一历史指称性。令人发噱的是,“典型”一词本是指显示共性的某一个体;但当它有幸变为现实主义的美学范畴后,却又无意有意地成了人物性格的替身,它既表征时代或阶级共性与人物个性的辩证统一,同时又是意指时代或阶级共性的人物符号。时代或阶级共性是人物个性赖以发扬蹈厉的精灵,人物个性则是时代或阶级共性借以寄宿且延绵的躯壳。“性格”由此沦为“典型”的附庸。无怪苏联在 20 世纪 40 年代讨论人物造型时要打“典型问题”旗号而不打“性格问题”旗号。因为在号称“革命”的现实主义营垒,“典型”作为“性格”的代名词早已喧宾夺主且顶替了后者。50 年代至 60 年代的中国文坛亦然,“典型性格”这一曾由恩格斯审定的偏正型复合概念,在历经“性格的典型化”这道逻辑手术后,竟也神不知鬼不觉地被蜕化为某种“性格典型”;至“文革”前夜,江青悍然宣告“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更是一举将“性格”驱入冷宫。是的,当“典型”所包含的“社会生活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进而被钦定为宣传某一既定方针,绝对效忠政治的文艺当然不必去雕琢人物的个性生命,这就像“狠抓阶级斗争”的方海珍只要能把钱守维揪出示众即是,至于本人有否女性魅力或丰富性格,这诚然无关宏旨。“性格”被遗弃了。当时,在那气象萧森的文坛,尚能斗胆对人物的个性生命即“性格”怀几缕幽思的,大概除了何其芳“文化共名说”,很难再能觅到第二个代表了。有趣的是时隔廿年,接替了何其芳的行政位子的刘再复,在性格美学方面竟不仅颇少提“典型”,相反,刘再复一头扎进性格的结构形态与机制,深深地被那宇宙般幽邃、生命般丰饶的性格世界所迷醉,以致时有失语。

性格范畴在美学王国的贬黜与复出,犹如活化石沉积着当代文

论的曲折走向,同时也折射出人道主义的苦难历程。文学写不写“性格”,美学讲不讲“性格”,说到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唤起的人性意识有否复苏的问题。文艺—美学中的“性格”就这样像水文标尺测出了人文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跌落与高涨。江青样板戏的人物造型为何是概念化、脸谱化,“美丑分立”的?因为当人在现实中无权以完整人格处世,而是被强行规定为阶级机器上的螺丝钉,他就只能面临如下抉择,要么革命,要么反动,第三条路是没有的。这投射在文艺—美学舞台,便是革命者充满神性通体光辉,反动者充满魔性满腹祸水,亦即“美丑分立”,“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刘氏性格定式是反“美丑分立”的。刘再复将性格的美学运动描述为从“美丑并举”向“美丑泯绝”的转化过程。^①假如说,“美丑并举”是指性格的发生应以矛盾型两极因素的鲜明对立为机制,那么,“美丑泯绝”则指性格的生成,它须凭借深层灵魂搏击,让上述正、反两极因素的界线趋向模糊或消融,使人物变得“美中有丑、丑中有美、善中有恶、恶中有善”,盘根错节,深不可测。既不是一句话即可点穿,也不是许多话便能道尽,但不可能不为其个性生命的真实、丰盈、深邃所倾倒。显然,刘氏定式旨在突出人——即性格造型的使命并不在于图解特定时代场景或政治指令,而在于通过对人的现实生命的极度逼近,来审美地演示出人的精神存在的丰瞻或人格尊严。

对此,刘再复倒不避讳,他曾屡屡直言“对人的研究”确是《性格组合论》的“中心和支撑点”^②,正是以往“人为地把人自身贫乏化,导致了文学的贫困化,也导致了民族精神世界的僵化”这一心灵历程成了“我最初写作《性格组合论》的动因。”^③这表明:第一,刘再复对性

①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第71—72页。

② 同上书,第11页。

③ 同上书,第8页。

格探索的动力与其说是纯学术的,毋宁说是对历史—现状的反思;第二,刘再复对人的兴趣其实已超过对文学性格的兴趣,这样,他也就不会也不可能将其探索流连于性格美学框架,相反,他倾心于文学性格的形态与机制,不过是想借此破译出一般人性的永恒结构或人性之谜。也因此,他倾向于从广义而非狭义的角度来探讨性格,即不把性格视为是现实主义小说中常见的“一个人较稳定的对现实的态度和与之相应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而是“把性格看成是人的自然欲求和精神欲求的追求体系,看成不仅是行为方式而是包括心理方式、感情方式的总和”,^①这么一来,性格似乎也就成了人的现实生命存在的美学化身。乍一看,这是在打通美学与人学的跨学科研究渠道,但同时,这也使美学同人学的学科界线转为含混,以致你分不清“一元二重整体深层结构”这一刘氏定式,到底是特指艺术形态的性格呢,还是也泛指历史形态的人。

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从美学向人学的思维偏移,根子是在:该理论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的关系,从开始就处于微妙的悖论状态。不错,历史起点作为诱发科学研究的现实性意向,本源于理论家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感应,它是颇具动力感的;而逻辑起点则是为实施历史起点而建构的某一学说的核心范畴或元概念。换言之,逻辑起点不过是历史起点的学术陈述的第一步。但这一步又委实不好走。因为从意向型历史起点到学术型逻辑起点,两者间将发生思维转型,这一转型能否成立,全取决于这两个起点之间是否蕴有某种本体性同质通约。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无疑是同质通约的,因为无产阶级解放这一意向的实现必然以资本主义崩溃为前提,而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秘密皆凝缩在商品这一细胞里,所以,以

^①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第48—49页。

“商品”范畴为逻辑起点,对商品两重性的剖析及其演绎愈彻底,便愈能使“资本主义崩溃与无产阶级解放同样不可避免”这一结论显得圆满。相比之下,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却有点貌合神离。是的,“性格组合论”的历史起点是研究人,而作为其逻辑起点的“性格的二重组合”似乎也是“人”;但明眼人明白:此“人”不等于彼人,或带引号的“人”不是人,即作为历史形态实在的人与作为艺术形态虚构的“人”实为两种异质本体,不宜作简单类比。诚然,当目睹哲学挺进人性迷宫受阻,美学机警地绕道文学性格去曲径通幽,这本无可厚非,关键是由于文学“人”与历史人互为异质,故这两者只在极有限的意义上才能挂钩,而不许轻易划等号。刘再复不慎划了等号,这就难免在其理论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之间播下了一颗貌似弥合实为疏离的种子。这是某种参照系的紊乱。倘若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的“支撑点”确系为人,那么,人学的研究对象理应是历史地实践着的人的行为与心理,而不该到文学性格身上去勘探一般人性结构(除非你能证明性格造型本是对相应时代的人的生命存在的全息摹写或复制,亦即证明艺术真实完全等于生活史实,这显然是反逻辑的);倘若其“性格组合论”本非人学而是美学,那么,刘再复也就不宜用普通心理学方法去穿凿文学性格的形态与机制,因为孕育文学性格的直接动因并不源自有血有肉的科学“被试”,就像形成人性结构的根子不会扎在文学土壤一样。于是人们发现,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仿佛被悬在极为尴尬的两难之境,其逻辑起点所说的其实并非是历史起点所亟待陈述的;而历史起点责成逻辑起点应承诺的却又未能兑现。想不到头环扣错,环环皆错。现代科学又将此“钮扣效应”叫作“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即计算机程序所隐含的任何细微误差,在运演过程中必然像病毒传播似地被放大到不堪收拾的极度混乱状态。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的同质通约,可以说,正是